

高校党建赋能“百千万工程”

■ 暨南大学党内法规研究中心 王高贺,暨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周智锋

党的二十大把高质量发展确立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对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作出战略部署。2022年12月,广东省委提出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以补足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短板。广东省以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需求为导向,联合省内高校院所结对到县,开展百校联百县助力行动,广泛动员广东青年大学生投身“百千万工程”建设之中。高校基层党组织汇聚教育、人才、科技等优势,在助力“百千万工程”上具有鲜明特点和优势。

夯实基层党组织,凝聚校地两通协同力。农村基层党组织是落实“百千万工程”部署,推动乡村振兴的着力点。农村基层党组织应当积极与高校保持联系,确保信息畅通,实现“双向奔赴”,通过“党建引领+党员组织+群众参与”的模式,打通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高校基层党组织应当顺应新形势,提升基层党建工作质量。首先,通过引导外部政策机制进乡村,在乡村宣传贯彻党关于乡村振兴的最新政策。其次,建立学校和结对县镇村党建共商共建共享长效机制,加强学校

和结对地的沟通协作,开展深度合作,解决帮扶过程中出现的重点难点问题,实现校地优势互补,推动“百千万工程”落地见效。

淬炼青年党员本领,锻造一线攻坚实践力。高校具有丰富的人才储备和教育资源,面对“百千万工程”发展的新要求新部署,高校基层党组织应当坚持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为结对县村镇注入更多新的活力与智慧。一方面,发挥高校优秀青年教师党员的优势,通过教师党员带队帮镇扶村,将自身所积累的扎实专业知识和丰富党建经验浇灌在村镇发展的土壤上。另一方面,号召高校青年党员积极投身于“百千万工程”。乡村基层是青年党员实践的一线舞台,而青年党员应利用新视野、新思维的优势,剖析各县镇村的特点,以“党建引领+党员示范+群众参与”推

进工作,提升对一线实际情况的把握能力,锻造一线基层实践力,不断为“百千万工程”强筋壮骨。

深耕乡土文脉,厚植乡村文化软实力。《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年)》指出要“繁荣乡村文化,培育新时代文明乡风”,提升乡村精神风貌、重塑乡村文化生态、增强乡村文化影响力。各县镇村历史发展文化丰富多样,为高校实践队伍提供了多元角度。高校与结对地基层党组织主动作为,引领青年大学生扮演“推动者”和“服务者”,结合自身专业和技术特长,深挖本土文脉,推动乡村文化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鼓励适合乡村条件和文化特色的各类活动创新设计,例如“村BA”“乡村音乐会”“乡村运动会”“乡村嘉年华”等,盘活乡村传统文化,厚植乡村文化软实力,提升群众幸福感和获得感,也为年轻一代

创造了深入了解当地独有文化遗产的机会。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乡村文化的创新再现,是文化自信的有力彰显。

延伸企业产业链,释放产教融合支撑力。在百校联百县的助力实践中,高校党建不仅要联动各县镇村双向发力,更应该创新多方运作模式,例如“县镇村+高校+企业”,丰富“百千万工程”的发展路径。高校作为连接地方基层与企业的桥梁纽带,应强化党建引领作用,坚持党建联建,发挥企业参与“百千万工程”的关键支撑作用。“千企帮千镇、万企兴万村”行动的深入推进,凸显了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在校地企三联互通互动过程中,企业应持续探索多方共赢机制,结合县镇村的资源特点、企业文化等,开拓新产业、升级成熟产业,延伸企业产业链,打造“红色文化+绿色产业”等发展模式,培育新

业态。除此之外,企业凭借资金、技术、场地、市场等优势,为高校队伍提供资源支持,建立产教融合平台,开展产教融合实践培训,使得乡村实践成果实现有效转化。

创新技术应用,强化“党建+”治理驱动力。《关于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指出,推进抓党建促乡村振兴。高校拥有先进的科研设备和技术应用研究成果,为“百千万工程”提供技术支撑,驱动县镇村治理实现新转变。利用互联网、线上媒体、多终端传播等创新手段,推进高校党建在乡村的深入发展,形成高校“党建+”的帮扶治理模式,实现党建引领和乡村治理的有机结合。高校实践队伍还能够开展技术培训,应用人工智能技术,结合地方特色,聚焦生活、教育、文化等主要场景,整合乡村人口、土地、产业等信息,了解群众的需求,及时有效解决群众问题,使乡村治理更加数字化和智能化,提升乡村基层党组织治理和干部队伍管理水平。

本文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农业职业院校思政课实践育人模式改革探索

■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张春明

随着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持续推进,作为培养高素质“三农”人才的重要阵地,农业职业院校责任艰巨。然而,传统的思政课教学模式侧重于理论讲授,实践教学相对薄弱,难以满足社会进步的需要和学生职业发展要求。思政课融入实践教学环节可以打破传统课堂教学的局限性,为学生提供直观、沉浸的教学体验,获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一、农业职业院校思政课开展实践教学的重要性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任务的关键课程,这一教学目标的实现不仅需要学生掌握科学的理论知识,更重要的是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在生活中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理论知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实践教学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保证,实践教学可以将课堂上的理论知识和实际生活相结合,更加深刻地理解思政教育的内涵和意义,进而增强对思政课的认同,感悟“三农”情怀、做到知行合一。

契合职业教育培养目标。大学生正处于人生中身心快速发展的关键时期,特别是对于农业职业院校的学生来说,想要走好人生之路,不仅需要掌握扎实的专业技能,还应具备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社会责任感和创新精神,职业道德和职业素养才是未来在职场中立足的关键。思政课实践教学紧密结合学生特点,将思政教育融入职业实践,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职业纪律、职业精神。

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大局。乡村振兴的实现、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关键在人。农业职业院校要着力培养“靠得住”“用得上”“留得下”的优秀“三农”人才。思政实践教学深度嵌入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全过程,既解决了人才培养水土不服的问题,让农业职业院校和地方深度融合,形成双向奔赴的良好局面,实现教育价值与社会效益的双赢。

二、农业职业院校思政课实践教学困境

教学设计简单粗放。部分思政课教师缺乏实践教学经验和能力,存在形式化、缺乏农业特色等问题,在组织实践教学活动时,容易出现教学管理无序、没有明确的进度要求甚至出现学生打卡应付等极端情况。同时,普通教师对乡村振兴实践基地和红色场馆等地的了解有限,难以充分利用社会资源为实践教学提供专业服务,因此实践教学质量不高,效果不尽如人意。

实践保障体系薄弱。在现阶段,思政实践课保障机制较为薄弱。一方面,实践课没有像其他思政课一样,有统编教材,实践教学往往作为理论教学的补充,没有独立的教学大纲和授课计划,教学内容也缺乏系统性和内在逻辑关联。另一方面,现在许多职业院校的思政课实践教学尚处在探索或起步阶段,可以借鉴甚至推广的经验较少,更缺乏实现思政实践课程全

覆盖的安全保障机制。

协同机制联动不畅。协同机制联动不畅是制约思政课实践教学发展的重要因素。在校内,除了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思政实践之外,各二级学院、学工团委等部门还有一些实践要求,其中甚至存在雷同部分,做好校内协调势在必行。在校外,马克思主义学院和实践基地红色场馆等合作多停留在协议层面,缺乏良性互动和长效运行机制。对于农业职业院校而言,实践课的开展还要考虑作物生长期季节性,实践教学需配合农时(如春耕秋收),与正常教学活动可能产生冲突。

三、农业职业院校思政课实践教学优化路径

设计特色实践项目。农业职业院校首先要加强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全面提升教师自身的业务能力和管理水平,更新教学理念,掌握实践教学的基本技能。其次,结合学校和当地实际,制定富有特色的思政实践项目,如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制定的红绿融合思政实践项目,既突出了农业院校的自身特色,也展示了句容地区的红色文化传承。

构建实践教学体系。思政课实践教学体系的搭建一方面需要集合学校和社会的力量,对学校周边的思政实践场所场地进行整合,建立信息资源库,同时学校和场馆良好的双向互动才能让合作关系稳健持久。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和茅山新四军纪念馆、句容市档案馆等单位进行共建,积极进行互动,保障了思政实践的顺利开展。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学院内部也要对不同课程内的实践内容进行优化,避免活动的重复。

打造三维实践平台。思政实践课程的开展离不开现代化技术手段的加持。为提高实践教学效果与覆盖面,建立由实体平台、虚拟平台、移动平台构成的立体化实践体系,以多媒体教室、虚拟仿真实验室、智能教学设备为支撑,为教学技术的应用提供硬件支持。还可以通过大数据技术分析学生的学习状况、学习效果和学习需求,动态调整实践方案,按照学生的个人情况进行针对性的调整和指导。

完善教学评价机制。好的教学评价机制可以让教学活动形成良性循环。在思政课实践教学的评价中,一是创新评价方式。实施以学生为中心的评价改革,扩大过程性评价占比,提高学生的参与度,鼓励学生在社会大课堂中收获更多。二是完善教师考核机制。将定量考核与定性考核相结合,在保证实践教学正常开展的情况下鼓励教师开拓新的实践基地、尝试新的教学方法,切实提升教学效果。

优化农业职业院校思政课实践教学,具体而言就是推进“思政课小课堂”与“田间大课堂”,专业成长与个人素养深度融合,引导新时代青年学生在“接地气”中成为优秀的“三农”建设者。

数字劳动的剥削性探析——基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视角

■ 广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谭镇涛

随着技术的发展,我们正逐渐从工业时代步入信息时代。在这一背景下,数字技术逐渐成为支撑资本发展的必要设施。与此同时,还诞生了一批新型劳动力,即数字劳工。数字劳工的出现逐渐取代了传统劳工的地位。数字技术的发展改变了资本生产的方式,带动政治经济不断转型。数字技术不仅影响当前人们生产和生活方式,还催生出了一种新型劳动形式——数字劳动。值得注意的是,数字劳动的出现依然没有摆脱资本的剥削与规训,反而将这种剥削扩大化了。

一、数字劳动的发展历程

在分析数字生产方式中,数字劳动是无法回避的一个概念。数字劳动囊括数字技术与ICT(信息与通信技术)产业链上的所有劳动。奈格里和哈特注意到了数字技术带来的劳动泛化问题。“在工厂社会的时代,以及在计算机化的生产取得胜利的阶段,社会作业扩展至社会的各个场所。这就将我们引向一个悖论:就在理论无法看到劳动之时,劳动无处不在。”也就是说,劳动已然打破了工作与闲暇的空间界限,弥漫在整个社会之中。劳动形式也逐渐从传统的物质劳动转向非物质劳动、数字劳动等新形态。福克斯认为,当我们使用社交网络时,会接触广告。指尖滑动界面的同时,后台算法早已悄然捕捉并解析着我们的偏好,从而勾勒出精准的数字画像。这一切的指向很明确,将适配的广告推送给我们。当我们被广告所吸引时,我们便转化为一名“产消者”(prosumer)。可以说,福克斯真正发现了一种不同于传统劳动形式的劳动。互联网出现之后,用户的这种行为才被定义为数字劳动。拉扎拉托将数字劳动视为“可以是参与生产、加工和传播信息的所有劳动,可以是直接通过操纵符号来生产原创知识的个体,也可以是图书馆员、快递服务公司员工,甚至是装配电脑路线和原件的工人,从事的都是数字劳动”。与奈格里和维尔诺一样,他们都用非物质劳动来包含一切在ICT技术下的劳动。在数字技术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后,数字生产方式便诞生了。

二、数字劳动核心要素“数据”

在数字劳动的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是“数据”。数据已然成为数字时代最重要的生产要素。研究数字生产方式,就必须关注数据在其中的作用。数据不仅是数字劳动的直接产物,更是推动数字生产方式不断进化的关键动力。在数字生产方式的背景下,数据也被赋予了极大的经济价值,成为各行各业竞相争夺的战略资源。然而,数据的采

集和使用也引发了诸多社会问题,如个人隐私泄露、数据安全风险等。这些问题需要我们进行深入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以此来揭示数据背后所隐藏的剥削逻辑和权力关系。在数字语境中,当数据在数字世界中进行交换,便会形成一个超越具体形态的“一般数据”,即所有数据在抽象层面上的呈现。据此,我们可以将数字劳动立足于“一般数据”的视野上。数字劳动所产生的从来不只是抽象的价值,更多的是“一般数据”。随着数字时代的来临,我们在日常生活和生产中所产生的一切数据汇总起来,就成为“一般数据”。与此同时,数字劳动的组织逻辑,就在于通过大数据算法对这些分散的数据进行处理和转化,形成可分析的数据体系,进而在互联网中发挥作用。

三、“一般数据”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诚然,这种数据的处理和转化并不是免费的,而是建立在对数字劳工的剥削之上。第一,“一般数据”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仅关注数据自身的价值,更在于揭示数据背后所隐含的资本剥削机制。平台通过收集用户的数据,利用算法绘制出用户画像,实现广告的精准送达。表面上看,这一过程确实公平无奇,但深入探究其本质,则可以发现背后所隐藏的实际上是对用户隐私权的侵犯。因为用户在使用互联网时,不得不让渡部分个人信息来换取权限,例如注册账户、开通会员等,这种让渡往往是建立在不对等的条件下。第二,“一般数据”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也关注数字劳动的无偿性和隐蔽性。用户在互联网上留下的痕迹都可以被认为是数字劳动的一部分,因为用户在浏览的过程中创造了数据。这些劳动看起来微不足道,但实际上,将这些数据汇聚起来就可以创造出巨大的价值。但是,这些价值往往都被平台和资本家所占有,用户几乎不能直接从中获取到收入。以马克思的逻辑来分析,曾经凝结为劳动的商品,如今被抽象为数据符号,人与人的联结也被数据与数据的关系所替代。这正是马克思拜物教理论的进一步延伸。

四、结语

数字生产方式的出现,不仅没有消除产业资本的剥削,反而将剥削的广度与深度进一步扩张了。因此,我们必须重新审视“数据”的价值分配与归属,确保数据能够切实惠及广大人民。对此,亟须搭建一个公平公正的数字环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数字时代的浪潮中,真正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进而向马克思笔下所描绘的“自由人联合体”迈出关键一步。